

肖垠
编著

提高农村基础教育的研究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说 明

(一) 本著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规划的“七五”教育科学重点项目《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和效益的研究》的修改稿。这个项目自1988年6月开题以来,历时三年,克服了始末料及的很多困难,于1991年8月完成。

(二) 本项目的研究目的是:以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指针,以改革传统的旧教育思想、变革基础教育的升学和应试教育性质为国民素质教育的宏观要求为中心,从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从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历史性弊端与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出发,比较系统整体地研究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和效益问题,以求为农村基础教育的改革提供理论和实际上的参考。

(三) 本项目的研究,采取考察、调查与总结经验、专题实验相结合的方法,务求研究有针对性,研究成果对实践能发挥作用。一般考察和系统调查的县(市),先后有山西省的左云、怀仁、代县、临猗、芮城、襄汾、沁水、灵石、石楼等9个县,还有山西省的晋中地区和吕梁地区;河南省的淅川、开封、辉县市等3个县(市);山东省的平度市;共14个市、县(市)和两个地区。同时,还在河南省开封县专门就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和效益评价问题,进行了为时一年的两轮实验。在项目研究组和协作单位努力下,写出了沁水、襄汾、临猗、代县4个县和晋中地区的调查报告,总结了五所农村中小学的办学模式经验,提

出了关于开封县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和效益评价的实验报告，并于1989年10月提出了十项阶段性研究成果。同时，作为研究过程中的“副产品”，还组织项目研究的有关成员，编写了《山西临猗农村教育——内地农业县农村教育改革之路》一书，并已于1990年8月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普遍反映很有时代性和应用价值。

（四）农村基础教育和城市基础教育就其性质、任务与功能作用来说，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有其不同特点。如何从农村实际出发改革农村的基础教育，使其从长期以来的升学与应试教育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改变成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国民素质教育，积极适应当前乃至下个世纪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际意义的课题。而且，由于我国农村基础教育面临的困难很多很大，在深入改革中，难以回避的居高不下的历史性问题 and 现实问题又很突出，难点很集中，研究和解决这一具有重大理论和实际意义的课题，尤其显得极为重要。

我国的农村基础教育改革，自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以来，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已经走出了一条比较成功的路子。这一大的进展极为有力的说明了，坚持“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方针，坚持教育必须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的指导思想，从农村的实际特点和需要出发，切实转变基础教育单一面向升学的教育模式为国民素质教育，充分发挥基础教育的多功能作用，认真执行农村基础教育的“双重任务”，使农村中小学具有升学和劳动就业两种准备，从根本上摆脱农村基础教育脱离实际的困难，能以积极适应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可能的。同时，从实际中可以看到，以提高国民素质为目标，坚持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途径，把文化科学基础知

识教育同劳动技术教育结合起来，使中小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打下比较全面的坚实基础，不仅是大有希望、大有可为，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在本项目的研究过程中，我们既对成功的范例和突破性进展充满喜悦与热情，也对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进一步深入改革充满着无比信心。

我国农村基础教育深入改革的路子越来越加明确，中国农村教育的社会主义特色越来越加鲜明。这就是在农村教育的整体改革中，必须从整体上转变教育思想，花大力气，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教育思想的根本性改革。加快农村基础教育的整体改革，特别是从根本上进行教育思想改革，还必须建立具有农村特点的教育新机制；加强党的领导，有地方党政第一把手的高度重视，有各部门的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县和乡镇教育部门的职能作用，充分依靠农村社区的人民群众的办学积极性。近几年，全国各地农村教育中创造并已推行起来“三教统筹”与“农（经）、科、教结合”的新机制，一改过去那种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农民成人教育各自封闭、各自倾斜的局面，有力地形成了不同对象、不同教学要求构成的，而又互为结合、互为依靠、互相协调的，为当地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新格局，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一新机制在发展中还将不断地完善，但它必将促使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和效益的有效提高，对此，我们也是充满信心的。

农村教育的整体改革，就其性质来说，是教育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大环境的总体有机结合，以大教育思想为指导，从整体上把农村的各类教育统筹、协调起来，在教育内部和外部进行系统的改革，以提高农村教育的质量和效益为管理目标，发挥农村教育整体功能作用的这样一种总体性综合改革；就其形式来说，则是通过“三教统筹”和“农（经）、科、教结合”的实施，实现农村教育和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及实施的一体化。在本项目的研究中，深感有了这样一个新机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农村基础教育

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必将得到更为有力的促进。

(五) 本项目的研究，之所以突出农村基础教育思想的根本性改革、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和效益的显示模式、农村基础教育师资素质的整体提高、提高农村基础教育的县乡(镇)两级规划、农村基础教育质量与效益评价等问题，而未着重涉及农村基础教育的课程、教材、教学方法等问题，是由于从总结经验与大量调查中深深感到，教育思想不端正、教育模式的脱离实际、教师素质不高、教育评价的标准不当、县乡两级又无切实提高质量与效益的规划，这些属于宏观上的问题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其它问题也都必然难以有大的突破，甚至会捉襟见肘。改革农村基础教育，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和效益的整体进程，必然要涉及到农村基础教育的管理体制、学制、课程设置、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等一系列改革，同时也必然涉及到教育经费的投入、办学条件的改善和教学设施的建设等方面，但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历史状况和现实情况告诉人们，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根本，至今仍然是深刻变革它的根深蒂固的应试与升学情况，使其转变为国民素质教育。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障碍，要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与效益，使之积极适应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能积极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将是十分困难的。从调查中看到，目前不少地方在抓改善办学的条件 的同时，并不重视从根本上着重抓教育思想的改革，尽管办学的外部条件较之过去已有很大改善，但仍然办的是升学与应试教育，这就很难达到提高国民素质、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目的。在本项目的研究中，一贯地强调教育思想改革这一根本，就是为了解决这样一个认识问题：如果没有教育思想上的突破，我国农村的基础教育，将仍是外壳上虽非禁止多年的科举应试教育，但实际上将依然是脱离农村、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应试与升学教育，而这是极其脱离当代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的。

鉴于本项目的研究，主要是以占我国县（市）多数的农业县为背景，而农业县区不论平原或山区，当前又大量存在着复式教学形式的小学，在计划生育的执行中，农村的学龄前儿童比之过去将继续减少，复式教学的小学将在较长期间办下去，因之专门提出了农村复式小学提高质量与效益的特殊规律与基本经验这一命题，为这一改革提供一些可行性的理论与实际参考。

（六）参加本项目研究的成员，前后变动很多，一贯坚持并提出最终成果的，是原河南省教科所副所长梁松山同志，河南省开封市教科所顾问梁伯奇同志，河南省教科所助理研究员郭恒泰同志；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副教授王殿璋同志与山西省吕梁地区教育局局长许海瀛同志，吕梁地区教育局李海维同志；山西大学师范学院讲师王秀芳同志；山西省沁水县教育局副局长张崇禧同志，该局侯有政同志；山西省教科所研究员萧垠同志。为本项目提供阶段性研究成果的，有山西省代县教育局原局长程润身同志，该局干部魏锋同志；原晋中师范专科学校校长陈哲卿同志、刘晋生和卫二平同志；山西省临猗县教育局局长曹文和该局办公室主任刘辉同志，山西省教科所助理研究员张启航同志。本项目总课题组的山西省教科所实习研究员卢红同志除担任秘书工作外，还参加了对河南、山西六个县的调查研究。参加初期调查的有朔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尧同志。

（七）在本项目的研究过程中，得到了山西省教委、河南省教委和山西省教科所、河南省教科所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山西省的临猗、芮城、沁水、襄汾、代县、左云、怀仁、灵石、石楼和晋中地区、吕梁地区等教育局，河南省的淅川、开封、辉县市等县、市教育局；山东省平度市教育局；江苏省宿迁市教育局等单位，对调查研究都给予了热情有力的协助。参加考察、调查、实验、总结经验的研究人员和教师，先后共有83人，研究成果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对所有单位和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协助，表

示十分的感激、

(八)本项目的研究成果,已通过了由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织的鉴定。鉴定认为:“这是一项很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它抓了我国基础教育的重点和难点所在——农村教育,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又抓了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这个关键问题。从总结农村教育的历史经验出发,探索其建设和改革的规律,特别是针对当前困扰着人们的若干热点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并确有某些独特之处”,“研究的指导思想明确,对农村基础教育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系统研究,提出了不少好的改革建议,有些还属于重大决策建议的性质。……很有参考价值,是当前教育科研成果的一个巨作和力作。”这一评价是对课题組全体成员的很大鼓舞,也是有力的鞭策。

(九)本项目的研究,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和缺陷,希望批评指正。随着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将在总结新的经验、实验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进一步研究后作出适当修改。

“七五”教育科学重点项目《提高农村
基础教育质量和效益的研究》主持人、
山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萧垠

1993年4月

目 录

说 明.....	(1)
----------	-------

第一篇 对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历史反思和现状探讨

——我国农村基础教育改革的根本是教育思

想的改革.....	萧 垠(1)
-----------	----------

一、对我国近现代基础教育的历史反思.....	(1)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基础教育中 几个基本的经验教训.....	(12)
--------------------------------------	--------

三、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八十年代以来几个 居高不下的难题.....	(25)
------------------------------------	--------

四、对农村基础教育性质、任务、功能作 用的认识问题.....	(47)
-----------------------------------	--------

五、德育为首为什么总是难以落实到位.....	(75)
------------------------	--------

第二篇 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和效益显示 模式

.....	萧 垠(83)
-------	-----------

一、教育模式是结构形式、思想模式的综合 反映.....	(83)
--------------------------------	--------

二、我国农村初等教育的多种形式并存及 模式改革.....	(84)
---------------------------------	--------

三、我国农村初中的多种形式并存及模式	
--------------------	--

改革.....	(90)
四、我国农村高中的多种形式并存及模式	
改革.....	(96)
五、农村基础教育的两种教学思想模式及其改革.....	(100)
六、片面的形而上学的质量观、效益观极其有害.....	(106)
第三篇 提高农村基础教育师资素质的整体改革	
.....王殿璋 许海斌 李海维 牛欣容 李建华	(112)
一、农村基础教育师资队伍现状与预测.....	(112)
二、迫切需要建立一支能为发展农村生产力服务的教师队伍.....	(130)
三、对农村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建议	
.....	(144)
第四篇 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和效益的县、乡(镇)	
两级规划.....王秀芳	(154)
一、县、乡(镇)两级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和效益的相关性分析和系统性分析.....	(154)
二、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和效益的县、乡(镇)两级规划.....	(174)
第五篇 提高农村复式小学质量和效益的特殊规律与基本经验	
.....侯崇禧	(186)
一、提高农村复式小学教育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性、迫切性、可能性.....	(186)
二、从复式教学特点出发,遵循复式教学	

规律,做好八个方面的工作……………(195)

第六篇 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和效益评价……………

……………梁松山 梁伯奇 郭恒泰(216)

一、基本思路……………(216)

二、指标体系的建立……………(218)

三、评价原则的具体化……………(242)

四、评价方法和技术……………(244)

五、实验过程与结果……………(249)

附 件

一、沁水县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和效益调查…

……………沁水县教育局 侯有政(256)

二、襄汾县农村基础教育现状调查……………

……………襄汾县教育局 尉吉安(274)

第 一 篇

对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历史 反思和现状探讨

——我国农村基础教育改革的根本是
教育思想的改革

一、对我国近现代基础教育的历史反思

（一）清朝末年的新教育，从一开始就有着一根深蒂固的应试教育性质

在清朝末年丧权辱国的残酷现实面前，张之洞、岑春萱等一些有识之士，曾多次建议取消科举取仕、广设新学，认为如不这样革新，读书人仍存侥幸得第之心，必将严重影响学子的“砥砺实修之志”，妨碍新的人才培养，而于国家富强不利。此后，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也都同样主张，并为之大声疾呼。始于光绪28年的，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国民教育思潮，继而特别强调了国民教育这一基础教育。在极其严重的内忧外患形势下，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决定废科举、兴新学；从此，包括基础教育在内

的，我国近代一套新的教育制度开始建立了起来，这对我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封建教育来说，勿疑是一大进步。但是，当时的新教育从根本上不可能不为封建统治服务，因而从一开始就具有根深蒂固的应试教育性质。从学校的课程结构看，虽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进了一部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但另一部分仍为应试需要而延续读经讲经的封建内容，未能脱离科举取仕的老路。

辛亥革命对封建的教育体系与教育内容，曾经是一次有力的冲击，但在教育思想及实施上，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仍然没能进行根本的改革。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这一时期的文化性质，曾明确地指出过：“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那时的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思想，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二卷P·696）。对于当时中国文化战线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对“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性质的精辟概括，对我们认识当时的教育，给了十分深刻的启发。就连梁启超，对当时学校的应试教育，也曾持批判态度。梁启超在1917年发表的《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一文，就曾尖锐地指出过：“近日对于教育抱有非常之悲观，以为今之教育方法，非根本改革不可。”他首先指出：“现在教育未脱科举余习也。现在学校，形式上虽有采用新式教科书，而精神上仍志在猎官，是与科举尚无甚出入也。……我国利禄之害，其中于学校久矣。……教育以做官为方针，必使全国人

有做官之思想而后已耳。教育不能普及，尚有农工商等人；一旦普及，则农也、工也、商也，将全变为官矣，世界宁有此等国家耶？”同时，他还指出了当时教育的其他弊端如“学问不求实”等。（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P·955，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第一版）当时整个教育如此，基础教育包括农村基础在内的根本性改革，根本上难以举步。

（二）“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促进了中国教育的重大改革

“五、四”这一反帝反封建的运动，是我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伟大而又彻底的文化革命。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党以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观，以崭新的面貌和锐利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向着封建的、帝国主义的文化展开了英勇的斗争，锋芒所向，包括教育在内，也无不发生了深刻的革命性变化。

新的教育包括农村基础教育在内，应走什么样的路子呢？毛泽东同志在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指出：

“‘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乡村小学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广大农民非常欢迎开办农民学校，“认为这样的学校才是他们自己的”，这种学校很快就在乡村中涌现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空话。”（《毛泽东选集》1961年版，第一卷P·39、40）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尖锐地指出了当时中国教育的脱离实际，在农村则明显地脱离了农村与农民实际；强调要从实际出发，办有特色的学校，在农村，创办有农村特色、切合农村实际、为农民所欢迎的认为是自己的学校。对这一方向性的办学方针问题，陈独秀早在1921年4月，也曾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新教育是什么》中指出过：“新教育是注意在

改造社会，不专在造就个人的伟大”。恽代英在1921年4月，也在《中华教育界》第10卷第10期发表的《教育改造与社会改造》一文中指出：“有价值的教育是改造社会的工具。应根据这个标准来培养学生的品德、学问、能力。要指导学生经常接触社会，瞭解社会。帮助学生求学择校，谋生择业，引导他们在职业界奋斗。”毛泽东在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经历的几个时期的文化革命以后，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二卷P·708~709）。这对中国旧教育的改造和新教育的建立，在一个历史时期里所起的根本指导作用，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全国解放以前的苏区教育、根据地教育以及解放区的中小学教育中，由于当时国内外形势的需要，在执行培养共产主义新一代这一教育任务的过程中，根据地的小学工作，一直都很重视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而且还强调了要发展儿童的个性，并提出了应予达到的基本要求。1933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会发布的《小学课程与教则草案》的《总则》中，规定小学教育应达到的程度为：“政治水平要达了解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基础”；“知识、技能、身体要达到能满足目前斗争和一般生活最低限度的需要，同时要准备将来学习专门知识和技能最低限度的基础”（《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P·284，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关于如何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的问题，就是在抗日战争的残酷环境中，革命根据地也是极其重视的。早在1938年9月3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发布的《关于健全小学问题的通令》，就强调了要“以改进小学的质量为中心环节，改进质量的工作首先从改进完全小学的质量开始，以完全小学的工作去推动和影响其他小学”。

(《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P·400,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此后又多次发出了提高教育质量的指示与决定。1941年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公布的《修正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实施纲要》中,进一步对小学教育的质量要求作了明确的规定:“应依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以促进儿童的民族觉悟,养成儿童的民主作风,启发儿童的科学思想,发展儿童的审美观念,提高儿童的劳动兴趣,锻炼儿童的健壮体格,增进儿童生活所必要的知识,培养儿童为大众服务的精神”(《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P·460,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形势在大发展,为迎接全国解放,1948年8月20日到9月5日在华北解放区召开的中等教育会议上,进一步完整地提出了:中学教育是普通教育性质,其任务是为国家培养具有中等文化水平及科学知识的人才。并强调了为切实加强文化教育,必须减少学生的社会活动、生产劳动和过多的政治教育。同时还明确指出了,必须重视课堂教学及教师的指导作用,教育内容必须切合实际,教育方法必须联系实际;学生应着重个人学习,辅以集体互助,在集体主义精神下发展个性(见《晋绥日报》1948年10月17日)。全国解放以前各个革命时期,根据地与老解放区的中小学教育,创造了极其宝贵的经验,这就是:为培养能担负起革命与建设任务的新一代,对教育必须改造,教育必须改革。对于当时中小学教育上存在的问题,也毫不回避地指出过,并进行过严厉的批评,这就是中小学教育方面存在的教条主义和“旧型正规化”的倾向,脱离实际、不完全适合根据地实际和群众需要的倾向。而这一切,都是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所提出的。

(三)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改革旧中国基础教育的强有力推动与影响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性影响下,在反帝反封建的

强有力推动下，旧中国的基础教育改革，为一些先进人物和有识之士非常重视。从读经讲经中解放出来，从封建思想中解放出来，从脱离生活实际与社会实际中解放出来，从应试与升学教育的学生过重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成为当时和以后我国进步教育界的一大思想洪流。以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为代表的教育家们，对旧教育的深刻揭露和坚持进行有重大意义的基础教育改革实验，集中反映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改革思想与实际的努力。

1927年1月1日，陶行知在《中华教育界》第16卷第10期发表的《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一文中，尖锐指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生活是什么？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教育”。陶行知在以后发表的《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教学做合一》、《生活即教育》、《育才学校创办旨趣》等文中，又力论“生活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不是作假的教育”；社会即学校，即“整个社会的活动，就是我们的教育范围”。“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乡村教育》第9期）。陶行知为了实践他的生活教育思想，在1927年创办了晓庄师范，在1932年创办了山海工学团，1939年创办了育才学校，具体实验生活教育，实行民主、大众、科学、创造的办学方针，几个学校办得生动活泼，既有高的质量，又有高的效益，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为人民服务的优秀人才。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在全国解放前的革命根据地，得到了极大的重视，有着广泛的影响。1942年2月，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教育室召开的陶行知教育思想讨论会上，李维汉在总结发言中指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有三个基本思想：一是主张生活教育，反对与生活脱离的洋化教育和封建传统教育；二是主张普及教育、大众教育和大众文化，反对教育和文化为少数人独占；三是主张教、学、

做合一，反对为读书而读书（李维汉：《回忆与研究》，见《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P. 483，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李维汉同志指出的这三点，也正是纠正中国基础教育的根本弊端所应进行的教育思想改革问题。

对旧中国的教育弊端，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也莫不痛心疾首地呼唤改革。早在1920年9月，恽代英就在《中华教育界》第10卷第3期发表《编辑中学教科书的先决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学教科书内容陈旧、抽象、高深、广博，各学科互不联系，以教师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生为中心，不切合日常生活，其结果是学生课业负担太重，求不到真正的学问。关于中小学学生学习负担过重、教学脱离实际问题，林励儒于1934年12月发表于《教育杂志》上的《从批评中学新法令说到未来的改造》一文中，也尖锐地指出：中学课程硬化，授课时数多，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不适合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特点（《教育杂志》第24卷，第4号）。在1936月1月出版的《教育杂志》第26卷第1号《课程问题专号》上，当时教育界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同样指出：中学课程分量太多，学生负担过重，有碍身心修养；学生专事记忆书本知识，丧失慎思明辨触类旁通的能力；小学课程也不能充分注意社会的需求。对此，就连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教育大员蒋梦麟，也不得不承认地说：小学课程复杂，负担过重，教学质量差；教育与社会不能吻合，应从实质上进行改革（1934年7月29日《教育日报》）。

中小学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教学脱离实际，极其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从清末民初直到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始终存在这一问题，当时的教育界有着颇多针对性的批评。这就是，把基础教育办成了升学与应试教育，极其脱离生活与社会实际，未能名副其实地成为国民教育，未能在升学深造和就业需要两方面兼顾，未能切合实际地全面而又正确地发挥基础教育应予发挥的功能作用。这的确是一针见血的本质性揭